

捡橘皮的日子

罗选民

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母亲外上班时，总忘不了叮咛一句，“崽伢子，上课去时要记得锁门，放学回家了就要把门闩好。别让小偷把被子偷了。乖！”被子，是我们家最值钱的物品，是全家抵御寒冬的依赖。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一床被子居然对一个家庭有那么重要。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对我接下来要讲橘皮换盐巴的故事，会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管怎样，这是真实的故事。

我家共有六口人。爸妈，两个弟，一个妹，还有我。父亲每月的薪水五十元出头，对一个三口之家，这笔钱还算可以；对一个六口之家，则常常是人不敷出。父亲曾经做过小学校长，因家庭出身不好的缘故，后来被下放到一家工厂做供销员。由于常外地出差，加上不会规划，所以亏了不少钱。母亲也是因为成分问题，早几年就丢了工作。我们家每月实际上能支付的生活费不过四十元。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精打细算地使用的。尽管如此，家里还是会不时出现月底缺钱买油盐的尴尬情形。为了给家庭减轻哪怕一点点经济负担，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带着弟妹上街捡橘皮，希望能帮家里解决一点小问题。

京剧《红灯记》有一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虽然现在听来有些陈词滥调，但此言千真万确。为了解决生活之需，少年的我，常带童年的弟妹去捡橘皮卖，来补贴生活。

捡橘皮犹如打一场战役，我便是战区指挥员。弟妹们被组织起来，根据城市主要街道来划阵地，兵分两三路，分头行动。有时候，就按时段来划分，每人负责一个时段。主战场自然是解放路，那是市内一条最长最宽沿途商铺最多的双行道。

六十年代后期，水果没有很多种类。我见过雪花梨，听说红富士苹果则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就压根儿没想到有什么火水果。我们容易吃到的水果是桃、李、橘、桑。虽没有现在那些转基因品种好看，但昔日的水果都来自农民庭院或家地，土生土长，用现在常说的“地道的绿色健康食品”来形容还远不够。

六十年代的人比较朴实，在内地小城看到行人吃水果不是怪事。那时候的街道也不能与现在比，路窄，果皮箱不多，不少人吃过橘子后便顺手将橘皮扔在地上。我通常是背一个黄色的军挎包，从城北走到城南，然后从对面的人行道折回来，正好走一个

U字，往返路程大约八里。

不过，捡橘子皮的路线不是始终呈线性的。有时，你尾随一位吃橘人，但迎面又会遇到另一位食者，你只有将前者跟随到底，将他手中的橘皮截取后，再杀一个回马枪，尾追另一份猎品。

弯腰捡橘皮本来是一件很枯燥、很懊恼的事情，但对我们来说，这是能找到的几种赚钱补给生活的法子之一。只要能捡到橘子皮，就会感到高兴。在这样一种不断的体能运动中，还会有一种满足感——万丈高楼平地起，可不是吗！此外，不断地弯腰，可以让脊椎骨备受锻炼。几十年后，我成了一名学者，会在不同的国际场合遇到日本同行，在交换鞠躬行礼时，我发现自己的反应和脊椎骨的柔韧性丝毫不占下风。这恐怕也是得益于少年时的经历，捡橘皮的磨炼。

当然，捡橘皮经常发生在橘子丰收的季节。那时候，橘子新鲜，货源充足，价格便宜，食者如云。

捡橘皮最懊恼的事情莫过于“吊胃口”。记得有一天，我在街上跟随一位吃橘子的人，他吃得很慢，跟了几十米，眼看就剩下一两瓣橘瓣时，不知为何停吃了。怎么办？跟进吧，似乎有些犯傻；放弃吧，似乎更加愚蠢。心不甘。就这样又跟了百余米，最终拿到那块橘子皮。那应该是我耗时最长所得到的珍贵橘皮了。

有时你会迎面碰到一个食橘者，你直接管他要橘皮，他会马上递给你。如橘子还没有吃完，会连忙将剩下的两瓣橘瓣取出，将橘皮放到你的挎包里。此时，幼小的心灵会感到阵阵温暖，感恩之心从那时就得到了培养。不过，偶尔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不仅不给，还使一个斜眼，将橘皮狠狠地扔在远处，然后扬长而去。年幼但衣着整洁的我，遇到此事此景，难免心生一些难受。

捡橘皮的过程中，我长个子了。橘皮还得捡，面子也得讲。这时，我会带上小弟捡橘皮。小弟那时不过三岁而已，眉清目秀，十分灵巧。我背挎包，追踪目标，指挥他去捡地上的橘子皮，配合十分默契。天气不好时，小弟不能同行。没有了小帮手，怎样才能做到体面地捡橘皮呢？

我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取一根约八十公分长竹竿，一端嵌入一根铁尖，拿在手上，犹如一根拐杖。当发现散落在地上的橘皮时，我会昂头挺胸，利用眼角的余光，将拐杖上的铁尖准确地戳到地面上的橘皮。一块，两块，三块……待铁尖上蓄满橘皮时，便将它们一把拨到挎包里。动作之敏捷，旁人常常无法发觉。若干年后看到西方电影《摩登时代》，突然发现自己少年挂棍戳橘皮的动作，还颇有卓别林的范儿。

药铺只收购焙干的橘皮。橘皮捡回来后，如果不及及时焙干就会发霉腐烂。橘皮若烤焦或不到火候，药铺也不会收购。晚上，一个竹竿子架在火炉上，橘皮就铺垫在竹笼上。火炉上盖着湿煤球，一来蓄火，二来烤焙橘皮。焙干的橘皮在中医里面叫陈皮，用做药方，主治感冒、腹胀等疾病。

金黄的橘皮每次都是用个米袋满装着去药铺的。药铺掌柜戴一副深度眼镜，镜片一圈圈凸出来。他把秤砣在秤杆上拨来拨去时，我会伸长脖子，踮起脚站在柜台后，佯装认秤，生怕他会短斤少两。“五角五分！”在掌柜叫喊的同时，我感到一阵无比的失落——报价与预想相差太远，可我还得接受它，虽然只是几角钱，至少可以拿来买盐巴。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许炳堃与民初北大浙籍教授

陆建德

近日读《沈尹默年谱》（[郦千明](#)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有点意外的收获。沈尹默籍贯浙江吴兴，1883年出生于陕西汉阴。他的回忆《我和北大》收入年谱第719页至730页，此文作于1966年1月，也出现在王世儒和闻笛编辑的文集《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其中有这一段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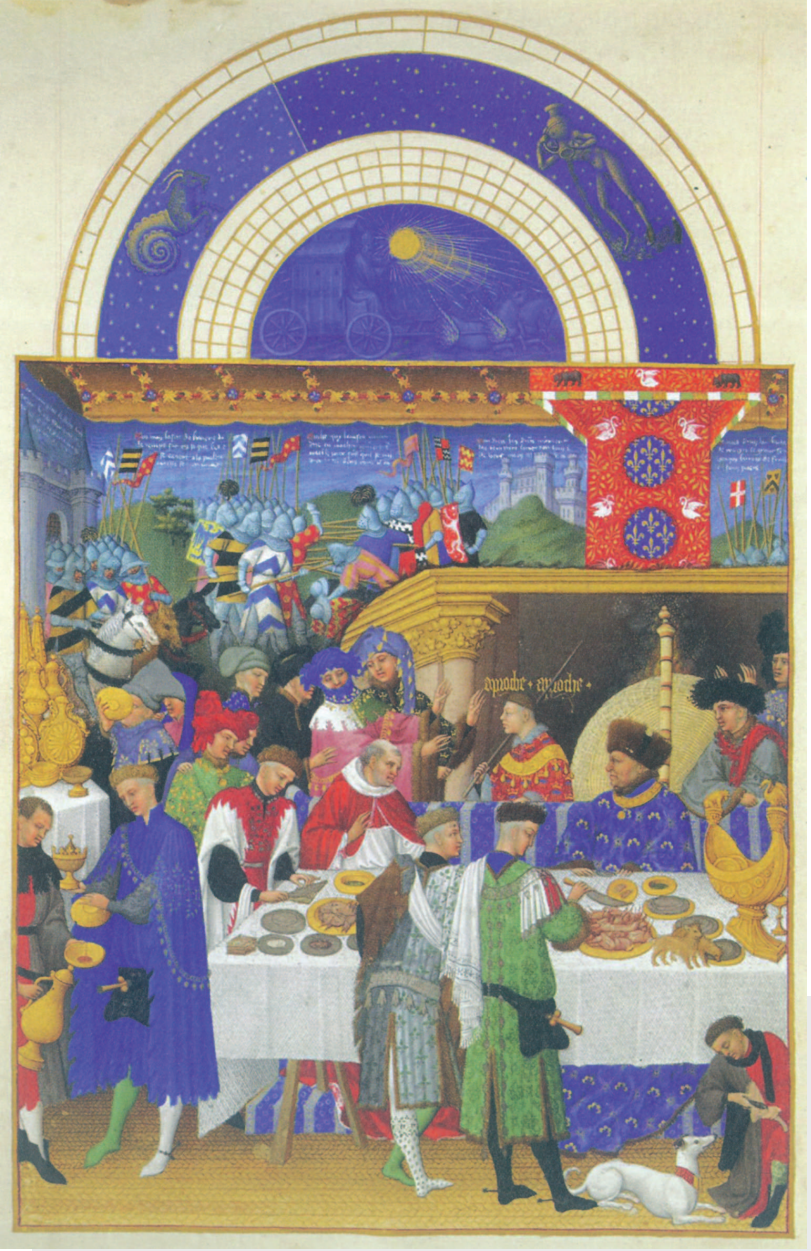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五十名陕西籍学生到日本留学（张季鸾即在其内），我和三弟沈兼士因非陕籍，不能入选，乃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求学，由一位四川名流徐自休先生率领赴日。当时，有一位在江西出生的浙江吴兴人蔡宝善在陕西做候补县官，因同乡关系，蔡写信给在日本留学的许炳堃（也是浙江湖州府同乡），托其照顾我和兼士。抵日本时，炳堃特来迎迓，从此订交。

这位在日本接待沈尹默和沈兼士的浙江留学生许炳堃现在很少有人谈及。

沈尹默游学日本九个月回国，在陕西居留一年，沈兼士则考取日本铁道学校，继续在东京读书。1907年，沈尹默和母亲一起回故乡浙江吴兴，不久到杭州教书。马裕藻当时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他与沈兼士在日本同学，都是章太炎门下弟子。1909年下半年，沈尹默在浙江高等学校教授掌故史，年底又结识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教的陈独

秀。钱玄同1910年归国后到浙江，在教育界任职。辛亥后，沈尹默、沈兼士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单不庵等人在杭州频频往来，他们很快就将北上京城干一番事业，许炳堃又有紹介之功。1913年年初，沈尹默经他向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何燏时、预科科长胡仁源推荐，决定去北大预科执教：

大约在1912年〔应指壬子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堃的朋友。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堃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真起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堃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贝里公爵豪华祈祷书·1月(羊皮彩绘)林堡兄弟[法国]

那年（1913年）2月，沈尹默抵达北京，就北大预科史学教员职，住宣武门外海昌会馆（浙江海宁古称海昌）。从此之后，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黄侃等章太炎弟子也陆续进北大教书。沈尹默将省籍（浙籍）观念支配下的势力之争提升到对自己有利的“新旧之争”的层面上来解释：“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林纾是举人，古文挥洒自如，而且已积有十几年翻译外国小说的经验，译作之丰瞻非他人可比，所写序跋更是我国比较文学与文化的源头之一，教授小说是合适的人选。除了周氏兄弟，教授这门课程绝非沈尹默或其他章太炎弟子的长项。林纾被迫辞职，不免愤愤，详情见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的《林纾家书》（[夏晓虹、包立民](#)编）。

何燏时（1878—1961）字燮候，浙江诸暨人，于1905年获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士学位，1912年12月至1913年11月任北大校长，他的前任是严复（章士钊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未赴任）。当时教育部曾以经费紧张为由准备停办北大，严复、何燏时都是保留北大的功臣，但是章太炎弟子都是在何燏时任上涌入北大，形成帮派，说明偏爱乡人是当时的陋习。何燏时也曾遭遇学潮，大部分学生占领教育部，不达目的，决不收兵。英国学者狄更生见状大惊，心中关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迷思也消散了。胡仁源（1883—1942）也是浙江吴兴人，继何燏时担任北大校长，直至1916年12月，接替者即蔡元培。浙籍教授专权，是许炳堃、何燏时和胡仁源无意之中造成的。

许炳堃与何燏时同为日本留学生。沈尹默记载：“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么另一位会不会是许炳堃自己呢？近日从1997年2月德清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现代德清名人》（[德清文史资料第六辑](#)）获悉一些许炳堃的生平事迹，他的学历只能说日本大专毕业，但是他对民国年间浙江教育和工业事业的贡献是很了不起的。

许炳堃，字埏甫，号缄甫，别字潜夫，1878年生于浙江德清，1899年考取德清县学秀才（附生），翌年赴杭州崇文书院学习，预备乡试。1903年年初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小石川区清华学校补习一年后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织选科，1907年7月结业，同年9月至1908年9月先后在东京麻布区日清纺织株式会社纺纱工场和京都捻丝工场实习，随即回国应清廷留学生考试，考取优等，给工科举人，1909年春应清廷殿试，考取一等，以内阁中书任用，在北京候补。夏，由浙江巡抚增韫奏调回浙，办理教育和实业。当时的浙江已有好几所实业学堂。



今年年初，我刚到英国两周左右，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猝然暴发了。最近，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等多国又相继沦陷。原本，我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认为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相隔一道英吉利海峡，或许能成为此次疫情迅猛攻势下的“漏网之鱼”。奈何如今有便利的全球化交通运输系统，再加上这段时间正逢假期，意大利北部的滑雪场一直是英国人趋之若鹜的热门度假地。不几日，英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便翻了两番，飙升到53例。对于一个国土面积并不广袤的国家，这样的确诊基数是可怕的。

一时间，“Coronavirus outbreak”（新冠病毒暴发）一跃成为英国BBC新闻节目最高频率的搜索词，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也被相关的报道所占据。一同在班戈大学交流访学的华人同学们提醒我，赶紧囤积物资，Boots的N95口罩她们可以帮我代购。华人留学圈里，大家奔走相告，让彼此尽快做好防疫准备。

但是，不少英国本土人竟十分淡定，甚至可以说无动于衷。就拿我的三位英国室友Georgia、Tom、Oliver来说吧，他们都来自英格兰地区：南安普敦、伯明翰、谢菲尔德。尤其Tom的家乡伯明翰，是英国人口第二大城市。这次假期之后返校，他们从家舟车劳顿回到我们宿舍，竟然全程不戴口罩，跟往常毫无二致。当他们看到戴着口罩的我，个个满脸惊诧，觉得滑稽和不可思议。

戴，还是不戴口罩？在英国是个问题

董 瑀

“你们可以囤一些口罩，还有一些保质期长的食物，最近疫情暴发期，尽量减少出门。”在厨房偶遇时，我抬高调门叮嘱道。“不不，我不戴口罩。”Tom笑得天真可爱，蓝眼睛里闪烁着急躁的神采，态度却是坚决的，“那是病人才会戴的东西，或者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医生才需要，我身体健康得很呢。”“可是新冠病毒有十四天潜伏期，戴上口罩的不一定生病了，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呀。”他看出了我的好心，一边安慰我放松心情，一边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晚又带回一群朋友在客厅里开起了Party。

相比而言，Georgia的防范意识略微弱一些，她从Morrison超市囤了几瓶杀菌洗手液，勤快地给厨房开窗通风。除此而外，也没有更多措施了。“我算是朋友中胆子比较小的”，她从烤箱里拿出一盘豌豆，边吃边聊道，“周围的朋友们很多都觉得媒体在夸大其词——病毒暴发期最坏情况有80%的英国人会感染，怎么可能？再说这个病致死率

只有不到2%，不必太过慌张。”“我很奇怪，我们国家一直在向公民宣传疫情期间出门必戴口罩，因为这种病主要是通过唾液传播的。可你们的政府只提倡洗手，为什么不强调一下戴口罩的重要性呢？”我不知道“舍本逐末”在英文里怎么说，但Georgia似乎听出了我言语之间的这一层意思。“我们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她挠了挠头，笑得有些尴尬，“在我们的观念里，如果你出门戴口罩，就是默认自己有病的意思。除非真有症状出现，不然没人愿意被误解为病人。而且，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人戴口罩，反而有点生气，最本能的反应是：你已经有传染病了，为什么出来晃荡，不在家老老实实养病？”听了Georgia这番话，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戴口罩走在路上，常常会接收到异样的眼光以及有一些戴口罩的华人留学生当街被打了的“缘由”了。

目前，英国的确诊人数还在逐日攀升，甚至有两次单日突破十例的记录。除了呼吁民众勤洗手外，英国政府并未做出更多实质性的举措；比如明确该病毒唾液传播的途径，强调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护；比如限制人口流动，将意大利回国人员集中隔离十四天；比如学校停课、公司停业，大型人群聚集活动取消，阻止病毒进一步扩散……以上这些常规操作，一律没有。以我所在的班戈大学为例，老师们还在热情高涨地参加罢工集会，不参与罢工的老师则在学校正常上课。我所居住的圣玛利宿舍区管理员，还跟往常一样发送宿舍联谊的通知，鼓励大家走出房间，广交朋友、感受多国文化。此外，Pontio文娱中心人头攒动，讲座和戏剧表演还在按原计划进行……

昨天，负责国际交换生安全事务的Christine发邮件告知我们：“新冠病毒只在英国境内小规模传播，不必惊慌，尽情享受生活吧。”可是当天的确诊人数已升至39，她却写成了几天之前的23。如果说，班戈所在的威尔士地区相对安全（目前只有1例确诊），人们不够重视情有可原，那么询问了一圈在英格兰地

区留学的朋友们后，我是彻底困惑了：伦敦、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伯明翰这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人们也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儿，地铁、巴士、火车、餐馆、景区人满为患。除了药店和超市里的洗手液异常畅销外，日子跟以前没差别。我的室友Anna刚从伦敦旅游回来，她感叹道：“每当旁边有人咳嗽，我就心慌意乱。我有点害怕了。”可是，她本人照旧奉行着：不戴口罩、不囤粮、不放弃酒吧的“三不原则”。

窗外，正飘着浙沥小雨，又是一个天气阴沉的日子。下午两点，英国官方又将公布最新的确诊人数。留学圈的朋友们正在热烈讨论着回国事宜，我也给班戈大学发了邮件。在等待回复的日子里，我依然会坚持出门戴口罩，还要竭尽全力劝说身边更多的同学戴上口罩，增强预防意识。这不仅是我——一名东方人的一份善良，更是作为同窗室友的一份诚挚的关心！

2020年3月4日，英国威尔士班戈

1910年初冬，增韫奏案奏准创办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聘许炳堃为监督（校长），负责筹建，校址设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场官弄报国寺已停办的铜元局内。1911年3月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开学，设机械、染织两科，修业期限三年，一年后校名改为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1913年又改成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制延长至四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工校已增设化学科和电机科，并添加了几个工场和实验室。许炳堃还是国民党北伐胜利前杭州纺织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前驱，他合股创办企业，除了伟成和虎林两家丝织公司，还有武林铁工厂（即杭州机床厂前身），专门生产提花机、力织机以及各种机械配件。工校很多毕业生是江浙一带丝绸业的栋梁，如都锦生创建都锦生丝织厂。

在爱国热潮激励下，浙江工业界人士组织报国工业会，由许炳堃任会长，《报国工业会会刊》于11月创刊（至1925年共出版六期）。是年10月工校学生沈乃熙（夏衍）与杭州其他院校学生合办提倡新文学的半月刊《双十》（11月1日改名《浙江新潮》），由于刊发文章《非孝》被政府查禁。1920年冬许炳堃当选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前任为经亨颐。由于许炳堃为浙江发展教育、兴办实业成绩卓著，1917年至1920年先后获北洋政府的三、四、五等嘉禾勋章。1924年年初许炳堃因病辞去本兼各种职务，取别号潜夫，在杭州市郊寺院休养，第二年取法名圆照，信佛茹素。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立，改组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为工学院，设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三科，设备已开办多年的附设高、初级工科职业学校。1928年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名浙江大学。可以说，浙大的工科来自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许炳堃也是民国年间的浙大校长之一。

抗战期间许炳堃隐居上海襄阳南路，从此就移家沪上，但也时常来往于沪杭之间。他在襄阳南路寓所自设一间“佛堂”，堂内点香，墙上悬挂一帧佛像。1950年许炳堃由浙江省人民政府聘任为浙江文史馆馆员，1955年特邀为政协浙江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他在杭州应该也有住处。1957年他虚龄八十寿，在杭州的八位学生、下属还为他祝寿，并摄影留念。许炳堃1962年和1964年任政协上海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沈尹默晚年在上海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在上海政协会议上，沈尹默和许炳堃是应该有交集的。

1919年的中国，有很多事件值得记载，其中之一，就是那年成立的报国工业会关于如何“报国”的想法。许炳堃的《报国工业会会刊发刊词》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古代经书，自周官《考工记》外，专言工业，盖不数觐。汉唐以还，著作尤汗牛充栋。试检历代艺文经籍各志及各种书目以观，其专言工业者，亦寥寥罕睹。晚近文化日新，思想日进，潮流勃发，继长增高。或纵谈政治，或详稽伦理，而独于人生日用所需一刻不可离之工艺，转若以泛常视之，鲜有能潜心研究者，此非他人之咎，而工业家之咎也。夫事有专职，学有专攻。我辈既从事工业教育，则兴起振导、勉覆一簣，以开为山之先声，诎非我辈之责歟！间尝默察时势，权衡夫国与国相竞之理，窃谓救国虽多途，而工业为其一。结绳以降，重译所通，盖未有不恃智创巧术以为立国之基者，其可以偏废乎！同人等不自量其蚍负之力，欲以一得之愚，贡献社会，藉效嚆引，私冀一时才智之士，咸稍稍效其精神，于吾人生活切要所在，加以研求，意者识时之彦，亦有取于斯欤。

1919年不少刊物“纵谈政治，或详稽伦理”，固然重要，但许炳堃看到“智创巧术”和“人生日用所需一刻不可离之工艺”实为国家之间竞争的关键，其意义更值得今人回味。实业救国的思想常见于晚清，清末新政就把讲求实业当成国策，不过民国之后，这一脉思想和实践在历史叙述中已被归入另类了。夏衍和他一些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在五四时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校长许炳堃是温语相劝的。现代文学研究大概会以当时的学生为是，以校长为非。也许许炳堃在日本的求学和工作经历让他体会到救国之难。学生发泄感情，心理上满足，却会沾染愤慨、暴戾的风气，最终无益于研求工艺，增强实力。正如鲁迅在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所说：“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鲁迅全集》，第3卷，第96页）

许炳堃1965年7月1日在上海襄阳南路388弄13号病逝，享年88岁。我的小外公莫善祥也是德清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五十年代初离开杭州，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在襄阳南路166弄购置了一套石库门房子，离襄阳公园不远。他在五六十年代大概常去看望同住一条街的校长老吧。